

□ 袁达松

电视剧《宋耀如·父亲》展现了宋氏家族奠基人宋耀如跌宕起伏、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剧中对宋耀如与孙中山关系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里，有不少忠实可靠、竭尽所能的支持者，宋耀如更是其中甚为重要的一位。相识20多年间，宋耀如以各种方式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之间的关系独特而密切。宋耀如影响了孙中山的政治观，是孙中山思想上的良师。而在事业上和生活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亲人。

相似经历

宋耀如与孙中山有较为相似的早年生活和受教育经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宋耀如比孙中山要年长，二人同是广东人。宋耀如在少年时代即被舅父带领离乡，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在一家丝茶铺做学徒。这与孙中山12岁随母亲到檀香山、在兄长孙眉的店铺里当小伙计的经历相似。

另外，两人都接受过较为完整的西式教育。1879年孙中山进入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意奥兰尼书院就读，于1881年毕业。之后，孙中山就读于夏威夷的教会学校欧胡学院（现称普纳荷中学Punahou School，这也是奥巴马的母校）。但因为其兄孙眉担心他信教，孙中山被迫于1883年归国。回国后，孙中山先后入香港中央书院、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孙中山求学之时，夏威夷仍是君主立宪制的王国，而香港则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要从这些土壤上产生“消灭君主”的共和制思想几乎不太可能。况且孙中山从未在美国本土受过高等教育，对于那时的他来说，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是有些遥远的。而宋耀如就读于美国“圣三一学院”。宋耀如没有上过中国传统学堂，他的教育经历全部是在美国本土完成的。在美国留学十年，宋耀如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入的学习了解和体验，更

倾向于通过革命在中国建立共和制政体。

在1893年之前，孙中山关注的仍是君主立宪制。他在《伦敦蒙难记》中写到，自己于1893年在澳门参加了一个中国政治改良运动组织。“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为少年中国党（按即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于时势之所趋，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由此可见，1893年的孙中山仍寄希望于君主立宪制政体，而非民主共和制。

亲密战友

关于孙中山和宋耀如初次接触的时间虽然现在仍存争议，但多数学者认为他们是1894年在上海第一次会面。1894年初，孙中山计划上书李鸿章。孙中山与同村好友陆皓东到上海找广东香山同乡郑观应寻求接触李鸿章的机会。在郑观应家中，孙中山结识了另一位香山人王韬（“太平天国状元”，中国报业创始人），王韬还帮忙润色了《上李傅相书》。根据冯自由在《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中记述，“郑……政见颇与总理吻合。职是之由，时总理复结识陈延威、宋跃如（宋耀如）二人”，由此可知，孙中山认识宋耀如是通过郑观应介绍的。孙中山在1912年致友人李晚生的信中曾提及与宋耀如的此次会面：“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

亦师亦友亦亲人 ——宋耀如与孙中山关系钩沉



孙中山和宋耀如与友人的合影（前排左一为宋耀如）

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孙中山和宋耀如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因为他们都对对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感到强烈不满，加之二人都接受过较完整的西式教育，相似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相投的志趣理想，使得他们视对方为良友知音。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无暇也无心接待孙中山。孙中山对该次上海之行感到失望，于是出走檀香山参与组织兴中会。1894年9月，郑

观应安排将《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上，而宋耀如是《万国公报》的承印人。

从1894年起，孙中山与宋耀如开始频繁往来。中日甲午战争清兵节节败退，孙中山在《有志竟成》中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孙中山本来拟前往美洲游说革命，接到这封信之后改变了行程，说明宋耀如的地位十分重要，孙中山听取了宋耀如的意见。1895年初，也是经宋耀如建议，孙中山发起了革命党人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但是，起义计划遭到

破坏，陆皓东等多位革命党人被杀，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

宋耀如因革命身份未暴露而幸运躲过一劫。但他没有因起义失败而对革命丧失信心，仍然在国内冒着巨大风险，暗中支持孙中山。宋耀如在传教士和实业家身份的掩护下，在物质资源上对孙中山提供帮助。他的华美印书馆不单只印刷圣经等传教书籍，还为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印刷与革命有关的小册子。宋耀如在上海的印书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等办公地点成为革命党人秘密聚集的场地。宋耀如不仅将自己的资金慷慨资助给孙中山，还积极为其募捐。1905年，宋耀如远涉重洋到美国为革命募捐了200万美元。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虽然对革命不甚了解，但她一直坚定地支持丈夫，帮助丈夫接受爱国任务，而孙中山对宋耀如也报以十分的信任。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海外流亡时，每次秘密回国必然住在宋家。

宋耀如民主政治观的形成要早于孙中山，在1894年之前，宋耀如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解也比孙中山深刻。美国总统林肯在1863年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这也是宋耀如民主政治观的核心。电视剧里宋耀如临终前对孙中山说，“逸仙，你就是中国的林肯”，非常精到地刻画了两人共同的政治理想。虽然在夏威夷读书期间，孙中山可能就已经知道了林肯的这句名言，但显然直至1894年上书李鸿章之前，孙中山还没有将林肯的民主政治观点融入到自己的政治观念中去。而在1894年以后，即结识宋耀如之后，孙中山逐渐放弃了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幻想，开始

选用人史话

《吕氏春秋》与秦国的吸引力

战国时期列国崛起更替的基因密码（三）

□ 丁万明



秦王与吕不韦

才，做足了人才储备。吕不韦家僮万人、门客三千，其中对秦国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李斯、甘罗等贤才，这些人才并没有因为吕不韦身遭磨难而出走，而是大多留在了秦国，最终成为秦国的栋梁之材。

人才之外，吕不韦给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便是《吕氏春秋》。这部书是杂家的集大成之作，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文化建设最耀眼的成就。吕不韦出于商人的本能，试图把诸子百家择其善者而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化战略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正是凭借修著《吕氏春秋》，秦国一跃而成为文化发展的引领者，为统一天下准备了文化基础。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编写《吕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语道破了其真实目的：“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很多人对吕不韦的认识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都因为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开篇即云：“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这句话几乎成了后人认知吕不韦的盖棺论定。其实考其生年，吕不韦初见异人时至少不过年方22岁，说他是子承父业的富二代尚可，说他是大商人未免言过其实。我们不要被“奇货可居”的故事蒙蔽了双眼，其时的吕不韦不过是一个商人出身渴望经邦济世的热血青年。吕不韦相秦，推行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新的治国方略，提倡“义兵”，改变秦国“尚首功”的军功政策，慎杀交战国军民。吕不韦执政期间，《史记》秦本纪不再见新首若干记载。《史记》秦本纪说：“孝文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纵观秦史，秦孝文王前，

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君王均无即位“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做法。吕不韦认为片面强调苛断于法、唯法是治的治国理念已经过时，“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药，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之殤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矣”（《吕氏春秋·察今》）。吕不韦认为仁义德化能起到赏罚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主张“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功，不罚而邪止”（《吕氏春秋·上德》）。这和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截然相反，这才是他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指出，秦始皇与吕不韦的矛盾使得秦始王走了另外一条路线——了中国，“相反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讲，吕不韦的文化价值远远超过其执政功绩。

吕不韦应该算是一位文化建设的先行者、实践者，他其实是一位为了自身理想和文化理念而亡的殉道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扬雄之口评价他是“穿窬之雄乎”！就其人生际遇而言，吕不韦确实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其历史影响与文化建设的贡献而言，这样的评价未免失之公允。

借助“西河之学”“稷下学宫”两大平台，魏国与齐国相继奠定了国家强盛的根基。秦国的文化建设平台比较独特，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吕氏春秋》编书运动，成为加快秦国统一的助推器。魏、齐、秦三国相继崛起的基因密码尽藏于此。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这就明确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指导、深厚源泉、主体内容和鲜明特质，显现了我们党独特的形象、风格和气派。

我们党的政治理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党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精神武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是我们党始终不懈为之奋斗的目标。党的政治理想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革命意志、宽阔的世界眼光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雄心壮志，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有着本质区别。

我们党的政治基础是代表着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为民族解放和复兴、为国家独立和富强、为人民当家作主和过上幸福生活谋利益的政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党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始终得到人民的支持。西方国家政党代表的是部分阶级、部分团体和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了一己私利，往往为反对而反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效率低下，公信力受损，最终影响国家发展和民众幸福。

我们党的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证。我们党的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更好地以文化人，必将为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打牢基础，进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强化党

西方政党遇到极大困境，政党越来越难在选举、公投和应对各种风险中保持团结并发挥作用，政治衰败明显。

我们党的政治品格是崇尚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反映了高尚的、正直的、纯粹的、有益于人类进步品格。它坚决反对离心离德、搞阴谋诡计，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反对“假大空”那一套，反对奢侈挥霍和铺张浪费，反对特权思想和腐败现象，与资产阶级政党搞的言行不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金钱至上是格格不入的。

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

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政治文化过去先进不代表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将来先进。在新的历史时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党的建设遇到挑战，党内政治文化受到冲击。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由于封建腐朽文化和商品交换原则侵蚀党内政治文化，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潜规则等腐朽的政治文化死灰复燃，致使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作风败坏、纪律松弛、道德沦丧、腐败严重，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内政治生活出现随意化、形式化、平淡化、庸俗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充分汲取世界政党兴衰的深刻教训，提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发挥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的灵魂作用和对政治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更好地以文化人，必将为促进全面从严治党打牢基础，进入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强化党

构建民主共和国思想。

1906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里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分立的主张。其中，三民主义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相通，民族主义是“民有”，民权主义是“民治”，民生主义是“民享”。孙中山和宋耀如作为良朋知己以及拥有共同革命的经历，可以推测，孙中山从主张君主立宪制到推崇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宋耀如的启发。宋耀如在政治、革命思想上影响着孙中山，堪称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良师。

革命事业上的“父兄”

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十分紧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宋耀如携家人到日本避难。在此期间，宋耀如、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先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为孙中山处理函电、筹措革命经费等。宋耀如时常教育女儿宋庆龄要多关心国家政治形势，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她，最终促使宋庆龄走上革命道路。当二女儿宋庆龄提出要与孙中山结婚时，宋耀如表示强烈反对，但后来看到女儿心意已定，宋耀如不但承认了这门婚事，还为女儿备上了丰厚的嫁妆。可以看出，宋耀如正是因为共同的革命经历和政治理想，而最终认可了孙中山成为他的女婿。

此后的人生岁月里，宋庆龄成为孙中山革命道路上的亲密战友，而宋耀如也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孙中山。在电视剧《宋耀如·父亲》里，孙中山对宋耀如评价道：“你是我的至亲至爱，你是我的革命同志，你是在背后支撑我的一座大山。”宋耀如是孙中山的革命良师、知己良朋，也是他政治思想、革命事业上的“父兄”。宋耀如为人低调，但终其一生都在帮助孙中山，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近现代风云

内政治文化为引领，在全党开展作风建设、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等活动，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不断给党内政治文化注入生机活力。比如：强调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强调要坚持人民立场，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强调要增强党的意识，党员第一身份是党员，然后才是自然人，要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强调要维护中央权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调对党要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强调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每一个党员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都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强调要旗帜鲜明抑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操守，不能搞特权，等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进一步把党内政治文化的要求贯穿到政治生活制度安排的创新之举，是新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集大成。

当前，广大党员在理想信念、工作作风、党的意识、忠诚老实、组织观念、廉洁自律等方面有可喜变化，党内政治文化出现新气象，但是成果还是阶段性的。要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党内政治生态根本好转，关键是要持之以恒，使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和党的纪律、规矩、制度，都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因此，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全体党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继续努力，共同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使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